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之二

燕史

新編

金匱

上册

陈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孔

馬融曰召公以周既攝政致太平功

周公乃稱湯

張政烺



燕史纪事编年会按

(上册)

陈 平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书 名:燕史纪事编年会按

著作责任者:陈 平

责任编辑:江 溶

标准书号:ISBN 7-301-02862-8/K·197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版 者:北京成功信息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76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一版 199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定 价:48 元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序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是为了向国内外学术界展示我研究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重要成果，以及我所科研人员在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各项收获。这套系列丛书，专以北京地区为主，内容包括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图录以及有关北京史、城市发展史的专著、资料的整理、论文集和其它方面的研究著作等。这套系列丛书的撰著者，主要是本所的文博考古学者。他们把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创造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批著述。我们将其列入科研系列丛书之内，陆续安排出版，这对促进北京地区考古学科的繁荣和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将是很有意义的。

一

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人文荟萃，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明。北京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性的大都会，而且以她星罗棋布的地面及地下文物古迹再现着历史的辉煌。特别是北京地区不断破土而出的珍贵文物和重大考古新发现，不仅大大地丰富了人类艺术宝库，为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还直接为北京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早，还在中国考古学的萌芽阶段，即早在1927年，就开始了对北京房山周口店的猿人遗址的试掘，并于1929年出土了一颗引起世界轰动的完整北京猿人头骨化石。但是，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大量开展和北京地区考古系列的建立，则是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其前身即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学者完成的。四十五年来,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是近年逐渐发现和认识的。目前已发现的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不少于40处。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有门头沟东胡林人的墓葬(距今约一万年)、雪山遗址(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二期属龙山期,三期为夏家店下层)、平谷上宅遗址、房山镇江营与密云燕落寨遗址等(距今8000—6000年)。

北京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以平谷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发现最为重要。该墓不仅出土10余件青铜礼器甚为精美,而且墓中所出兵器中的铁刃铜钺早已蜚声国内外学术界,是目前继河北藁城出土同类器物之后,国内仅有的第二件。这一珍贵文物的发现,把我国用铁的历史又上溯了五百多年。

房山琉璃河镇董家林西周早期燕国城址和黄土坡村大规模燕国王室贵族墓的发现,为北京建城史和燕国历史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史料。特别是一批科学发掘的燕国有铭铜器,诸如复尊、伯矩鬲、克罍、克盃等青铜器的出土,为确定该处城址为距今3040年前的周初燕国都城提供了重要证据,从而使自汉以来就开始的关于燕国始封地的争论得到解决。昌平白浮村西周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和有字甲骨,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在北京地区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地也时有发现。昌平松园发掘的战国墓,出土成套仿铜礼器,并朱绘花纹,造型十分精美。而延庆葫芦沟、玉皇庙等处山戎墓(一说为北狄)的发掘,得以明确了山戎文化的属性和特征,从而将山戎文化与燕文化区分开来,丰富了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京史的研究内容。

秦汉时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进行了很多工作。对所谓的“古蓟城”周围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其具体时代提出了新的重要看法,即蓟城应在发现瓦井最密集的今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东汉以

后,由于洪水泛滥冲毁了蓟城东部,因而城址向西移建,两汉墓葬在城郊多有发现,而以丰台大葆台的两座西汉墓规模为最大。大葆台一号汉墓由墓道、甬道、外廊、黄肠题凑、便房和椁室构成。黄肠题凑由1万5千余根柏木方叠砌而成,是国内首次发现。此墓早年被盗掘,只有墓道内随葬朱轮华毂车三辆和马11匹,保存较完整。据研究,一、二号墓应为广阳王刘建夫妻墓,现辟为大葆台汉墓博物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遗址也不断发现。通过对蓟丘的考古发掘,发现其地下有古城墙基址。而在墙夯土之下,发现压有两座东汉墓。再与今八宝山地区出土的西晋华芳墓志所记蓟城位置及同墓所出骨尺折合晋里推算,从而确定此残墙即为西晋蓟城。怀柔夷里村发现的有纪年墓志的北齐墓较为重要。延庆宗家营,还发现了一尊背有“大代”字样的北魏鎏金铜造像,为研究拓跋氏推行汉化政策提供了实物证据。唐代的墓葬,在北京地区也有不少遗存。较重要的有宣武区姚家井唐薛氏墓,出土的古雕十二辰中,龙、蛇、鸡、羊等立体兽首人身像,造型生动,是唐代石雕艺术珍品。丰台区林家坟唐墓出土铜牛,造型逼真。据墓中出土残玉册研究,考定此墓应是史思明或史朝义父子墓。德胜门外冰窖口发现的张建章墓志,记录了唐文宗太和年间墓主张氏曾出访渤海国的史迹。

辽、金、元时代的遗址、墓葬,更是多有发现。在发掘、调查的数十座辽墓中,以赵德钧墓的规模为最大。它由九个圆形墓室组成,虽破坏较严重,尚保留三幅较为完整的壁画。金代墓葬的形制与出土器物,反映了随着汉化的加强和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正隆、大定时期,埋葬习俗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侧面反映了女真政治中心转移到中都的史实。北京西南部大房山脚下金陵的勘查,得以明确了金陵的范围。发现的金代石碑,为确定金代帝王陵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还发现一段残石阶御道和鎏金银面具葬具等,为研究金代帝王陵园提供重要资料。近年来配合城市改造与建设如西厢工程、京石公路、京九铁路、西客站工程、青年湖(金鱼藻池)等工程,获得一批辽金时期重要的遗迹遗物,是研究辽金宫殿区、苑囿布局建设的实证资料。金

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的发现,被列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现已建馆保护,并已正式对外开放。元代墓葬发现和清理近70余座,为研究元代墓葬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其中大德九年张弘钢墓出土的赵孟頫手书墓志,是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众所周知,北京地区辽代为南京,金代为中都,元代为大都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因此,探查这些古都的布局,不仅是研究城市发展史和社会经济史的需要,而且对现代北京发展的科学规划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是北京的重大考古成果。近年来探查了元大都的城廓、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并科学地发掘了城门和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从而查明了元大都外廓城的形制和范围以及皇城、宫城的范围等等。遗址出土的一批精美文物,诸如螺钿漆器、紫端石砚、凤头扁壶、围棋等,都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近数十年来,也发掘了一些明清时代的皇族、贵戚、嫔妃和文武官员的墓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十三陵中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定陵的科学发掘。该陵的地宫由五个高大的石砌券顶殿堂组成,异常宏伟壮观。墓内随葬大批玉器、瓷器、金银器、丝织品等等,宛如一座地下宝库。

如此等等。四十五年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地区科学考古序列的建立,是我所几代科研人员艰苦探索的结晶。为打开那一座座地下博物馆,我所科研人员付出了多少宝贵的青春和汗水!那上万件珍贵文物的重放异彩并得到妥善的保护,又凝聚着我所科研人员的多少智慧和心血!虽然有的学者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贡献将永远与这些古代文化珍品交相辉映,他们的精神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事业之中。

二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是北京地区唯一具有考古发掘权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城近郊区县古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及考

古学研究,对北京史以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研究。

随着北京地区考古任务的日趋繁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科研队伍也逐步得到充实和加强。现有工作人员近 50 多人(不包括所属两个博物馆),各类中级专业技术研究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多是大学考古专业、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和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我所现已有高级职称研究人员 11 人。他们是科研力量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设三个研究室。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北京市基本建设,遵循“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方针,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为了探索考古学上的重要理论问题及深入进行北京城市史、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也开展多项纳入国家考古科研规划的重点考古课题。

我们下属有两个即将开放的博物馆——“辽金城垣博物馆”和“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前者侧重展示 800 年前辽金建都于北京地区的考古成果,后者以 3040 年前周初燕国在北京所建立都城与几座燕王室贵族墓地的原状展示以及墓中出土的重要青铜器等遗物为主要内容。

首都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地下文物古迹埋藏的丰富,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我所认真贯彻“有利于基本建设,有利于文物保护”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成果,并磨炼和造就了一批优秀考古人才。他们不仅成为组织和主持不同历史时期遗址和墓葬发掘的行家里手,而且通过对发掘资料全面整理和综合研究,成为某个学术领域的专家,他们出版的著作、论文、考古发掘报告和在国内学术会上的发言,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北京地区得天独厚的科研环境和考古工作者献身文物考古工作的敬业精神,使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逐步进入全国一流所的行列。

我所研究人员撰写的考古报告和论文,大量见诸《文物》、《考

古》、《考古学报》等学刊。近年,我们还组织力量抓紧对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已出版的有《大葆台汉墓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四十年》、《古建辞典》、《铜器辨伪》、《辽金史资料长编》、《金中都》、《北京市志稿》(校勘一、二、三、四、五卷)等等。已经完成的有《琉璃河西周遗址发掘报告》(1974—1978年)《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燕史燕文化考古发掘目录》等。正在进行中的有《平谷上宅遗址发掘报告》、《延庆山戎墓地发掘报告》、《门头沟辽金窑址发掘报告》等。此外,北京地区石刻资料整理及《文物精华图册》等,也在按计划编纂中。

我所还编辑出版有《北京考古信息报》,现已出六期。该报注意宣传有关文物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及时报导北京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并不失时机地反映古遗址、古墓葬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该报不仅引起众多关心古代遗产的有识之士的兴趣,而且成为市领导在基本建设中保护古都风貌的决策依据。此外,我所还主办有一块供本所科研人员发表自己研究心得和成果的园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刊》,现已出刊四期。《所刊》、《信息报》均以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和富有新意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三

中国的考古学,已进入她的“黄金时代”。北京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北京地区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传统民族精神的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炎黄子孙的共同财富。将这批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及时公布,与学术界共享,真正成为社会所有,发挥其更大作用,从而推动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北京地区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出版这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的目的之一。

北京地区不断取得的考古新收获,推动了我所科研人员田野水平的提高和考古学理论修养、学识的增强。一批已经撰述完成或正在撰述中的论著,是我所科研人员艰苦探索和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及时

把我所科研人员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推向国内外学术界,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弘扬华夏文明,这是我们出版这套“科研系列丛书”的目的之二。

我所提倡艰苦严谨的学风,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鼓励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钻研的不同意见的争鸣和探讨、开拓,并力争为科学事业心强的研究人员创造一切走向成功的条件,从而使他们步入堂奥,造就出一批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对北京地区考古学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在当前,及时将中青年研究人员的著作出版,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要措施。这是我们出版这套“科研系列丛书”的目的之三。

我们深知,出版这套丛书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北京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对科研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出一批高质量的著作同时,也会将一批考古工作者推向学术殿堂。

我们也深知,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情况下,一套“阳春白雪”式的“科研系列丛书”的出版,并能坚持下去,并非易事。为此,我所将努力争取多方面支持与关心,千方百计地把这套丛书的编著出版坚持下去。今年为纪念北京建城 3040 年编辑出版的四种专著,就得到了文物局领导的支持,拨专款保证了出版。在丛书的具体组织安排上,我们的原则是:所里科研人员的著作,成熟一部,就推出一部,力争以更多的优秀著作向国内外学术界汇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学术界有更多的朋友关心它、支持它!

齐 心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序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陈平先生以多年功力，撰成《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一书，令人欣幸。陈平先生从学于张政烺先生，参加过陕西田野考古工作，富有经验，于秦国历史文化研究甚深；到北京市任职后，又专心探讨当地先秦文献与考古材料，收获殊丰。《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为其心血所萃，给今后燕国历史文化研究奠定良好基础，确是一部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

周初封燕，随之燕即建都邑于蓟，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北京房山琉璃河的发掘，特别是克罍、克盃的出现，证明燕国初封即在北京之说，已成定论。今年，将举行纪念北京建都 3040 年的学术讨论会。《燕史纪事编年会按》适在此时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

燕国历史的研究，在周朝各个主要诸侯国中，有其独有的困难。这是由于史缺有间，从西周到春秋，有关燕国的记载十分稀少零碎。春秋时期二百多年，《左传》、《史记》所提到的燕国事迹不过两三条，《燕世家》还有把姁姓南燕误作北燕之处。新出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第二章述燕、晋交战，章末说晋人在燕南大败燕师，系指姬姓北燕无疑，但对燕史研究也没有太多帮助。《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将涉及燕国的文献、考古材料网罗无遗，加以精心整理，勾画出燕史的基本线索和轮廓，当然是很不容易的。

燕国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召公在周初大臣中享寿最长，辅佐王室，其元子就封于燕，与周公子伯禽封鲁如出一辙。不过，鲁国因商奄之民，禀承周礼，为中原文化重镇；燕国则偏在北土，处于北方民族戎狄之间，形势和鲁大有不同。根据已有的考古学成

果，中原文化在商代已远传北方，例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青铜器，即可看出当时中原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并会。史传商朝封国孤竹，在今河北卢龙，绝非虚语。燕国的建立，不仅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中原文化向北方、东北广大地区传播的前驱。琉璃河发现的周初器物，多与王朝无异，便是明证。

正因为燕国这样的地理背景，其国势的升降消长每每同戎狄有关。由琉璃河的发现，包括所出金文来看，西周前期王朝与燕的往来全然畅通。董鼎记燕侯派遣献物于在宗周的召公，以及过去著录的燕侯旨鼎说燕侯亲往宗周见事，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个时期燕青铜器多出于辽宁西部，又可见国力所至的广袤。西周中期以后，形势可能有急转直下的改变，一直到春秋时，燕与中原诸国长期是相隔绝的。考其原因，应是穆王以后王室渐衰，北方戎狄民族转盛。如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所论，山戎东徙，狄人东侵，都对燕国形成压力。鲜虞、肥、鼓等狄人小国的形成，更切断了燕人南通王朝的道路。

春秋前期，山戎侵燕，齐桓公救燕北伐。齐又割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事见《燕世家》。这个要求恐怕未能实现，直至戎狄多被晋国吞并，燕国在战国时期终以大国身分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我觉得，燕国历史所蕴涵的疑谜就在这里。燕与吴国不一样，自初封起即未与当地土著同化，却相反地中原文化在那里扎下根来，广为扩展。经过了几百年的孤悬隔离，战国时的燕文化仍旧具有浓厚的中原色彩。这确实是需要深思的事。

战国时的燕文化，由于考古材料较多，大家有更清楚的认识。显然，燕文化是有其独特风格的。以文字为例，当时的燕国文字很有特色，和邻近的赵、齐等国差异明显。燕国器物的造型纹饰，在美术史上也有自己的位置。可是无论如何，燕文化还是属于华夏的一系。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系统的文化，随着燕国向北方和东北的开拓，传播到非常遥远的地方。

以上写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趁机向大家请教。《燕史纪事编

年会按》全书中,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新观点,远过于这些陋见,读者不妨细绎。总之,这不单纯是一部史料汇编,同时又是重要的研究成果,相信会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李学勤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夜

序

在北京建城 3040 年(1995 年)前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陈平先生 70 多万字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一书,编著完稿并即将出版。这部长篇学术专著的出版,是北京史、特别是先秦时期燕国史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必将会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承蒙陈平先生信赖与文物研究所齐心所长的委托,我有幸先期拜读了该书的稿本,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和启示。这部著作网罗宏富,我国古籍里有关燕史的记载几尽荟萃于是。对于凡有兴趣了解历史上雄跨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先秦古北燕国历史及其文化,或有志于研究燕国历史文化的学人,该书都颇值得一读。不宁唯是,《燕史纪事编年会按》这部著作更有特色和价值之处,是随文所做的按语。这些按语,正是陈平先生功力和心血的结晶。他站在古燕都的“黄金台”上,以燕国为中心,高屋建瓴,指点八、九百年间的燕国与宗周、燕国与春秋无义战的霸主、燕国纵横捭阖并争雄于战国列强之间所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史剧,评说了纷纭复杂的燕国及与燕国有关的风云人物的千秋功过。兴之所至,时有创见和拨开历史谜团之笔。因此,这部《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堪称是一部燕史研究的宏文力著,它填补了燕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如所周知,周武王灭商(公元前十一世纪)以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史记·鲁周公世家》)。召公奭作为周的同姓被封于北燕,与被封于营丘的齐和封于曲阜的鲁呈犄角之势,藩屏宗周王朝。当时“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史记·燕召公世家》太史公语)。虽然燕国在西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史籍里有关燕与宗周联系的史料甚少。例

如燕召公受封立国至公元前 841 年“共和行政”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除了燕召公的活动记述较详以外,《史记·燕世家》就只有“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句带过。因此,苦于“文献不足征”,一直是史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它的制约,燕史研究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

随着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本世纪三十年代对今河北易县境内的燕下都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这项工作促进了燕史和燕文化研究的开展。七十年代以后,北京昌平白浮周燕贵族墓地及大批青铜器的发现、琉璃河燕国王室贵族墓地有铭铜器的出土及城址的发现等,更推动了燕史和燕文化研究的活跃并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但与近年学术界展开的两周、秦、齐、三晋、荆楚等国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热潮相比,勿庸讳言,它仍处于“弱燕”的地位。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史料较少并缺乏系统整理和认真发掘。陈平先生有鉴于此,历时十年,埋首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时代的一百四十多种古籍和文献之中。他钩深索颐,沙里淘金,从如此卷帙浩繁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扒梳整理出洋洋数十万言有关燕国的史料,并汇为这部蔚为大观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此书的出版,将一改学术界“燕史资料匮乏”的旧观,并使从事燕史研究的学者受益,推动燕史和燕文化研究的前进和发展。

一代宗师郭沫若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燕史资料也面临这一问题。且不说燕史不少重大历史事件失载,就是古籍中保存的不多、而且较为零散的燕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不少脱简、错简或传钞错讹,致使燕国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的历史人物年代有误,或事件与人物张冠李戴,鹿马相淆,给燕国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虽然前人对此早有察觉,并进行了一定的考证和研究,但往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陈

平先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细心追索和缜密考订,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扑朔迷离的历史人物置于比较可靠的年代学基础之上,从而以历史编年为纲统驭资料。因此,这部著作不仅集燕史资料之大成,还充分反映了前辈学者整理、考订这些史料的成果,并在不少方面不宥于旧说而又有所发现和前进。

顾名思义,《燕史纪事编年会按》是以先秦时期的燕国兴衰为主线的。但该书并不仅仅止于此,它还罗致了燕国与宗周,与春秋霸主和战国列强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及和战无常的复杂、多变关系的史料。该书不仅有纵的发展,再现了燕自召公受封立国至秦始皇灭燕这一段历史;而且还有横向的比较分析,从燕国放眼各不同时期的诸侯列强,又是一部燕国与其它各国的关系史。正由于此书把先秦时期燕国的小气候与并存各诸侯列强的“国际”大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对我们研究和认识燕国对华夏文明所做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此外,《燕史纪事编年会按》还充分地反映了我国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陈平先生受业于张政烺、李学勤等著名古文字学家,并学有所成,曾发表过有关琉璃河燕王室墓地出土有铭铜器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因此,他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驾轻就熟,注意搜集并充分反映了北京及附近地区燕文化的考古成果、有铭燕国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研究、河北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以及《战国纵横家书》等近年出土文字资料,这不仅使燕史研究增加了一批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新鲜资料,而且使燕史研究不少有争议或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通过“二重证据”而得到了解决,从而使燕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加强。

如此等等。这部《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充分显示了陈平先生在文献考据学、古史年代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深厚的功力。

在当今商海大潮的涌动下,陈平先生站在“海边”不湿鞋,甘于寂寞和清苦,潜心投入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中,进行燕史的探索和发

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部《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就是他默默耕耘，辛勤探索的硕果。我们应感谢他对学术界大有裨益的奉献精神。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感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齐心教授，是她全力支持并为陈平先生提供了一切方便和条件完成此书的编纂。因此，这部《燕史编年纪事会按》，也凝聚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领导的心血，反映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科研水平，这部书是名符其实的该所“科研系列丛书”中的首批之一。该书的问世，无疑是北京史，特别是燕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推出这部高水平的著作以后，将会有“科研系列丛书”第二、第三批反映该所考古学取得的丰硕成果的著作不断问世，为繁荣我国的学术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王宇信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于芳古园寓所